

孙万勇 主编

见证



纪念石家庄解放六十周年新闻作品选编

1947-2007

河北人民出版社

见证

纪念石家庄解放六十周年新闻作品选编·中卷

孙万勇 主编



1947-2007

河北人民出版社

● 中 卷

石家庄的成长与发展



一、甲子·共和国第一城 新闻年鉴(节选)

石家庄日报作为解放石家庄第6天便诞生的市委机关报,60年来,一直承担着城市前进步伐的记录者、见证者、建设者和守望者的职责。《甲子》特刊,就是基于这一基础上,通过对石家庄日报社60年来重大新闻报道的梳理,勾勒出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前进的轨迹。

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全国第一个召开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孕育了新中国的雏形;

在这里,是抗美援朝军事“输出港”,见证了共和国工业的起步;

在这里,创造了动乱年代经济逆风飞扬,全国罕见的发展奇迹;

在这里,敢为天下先,“包”字引进城,率先迈出了城市改革的步伐;

在这里,市场经济崛起,引擎城市动力,民心河水荡漾,荣膺人居环境大奖;

在这里,实施户籍突围,布局京津冀,沿海意识觉醒,“一体两翼”战略再发力;

历史正掀向更为辉煌而璀璨的一页。

《燕赵晚报》安文联、李历峰、徐书乐、侯佚、房建浩

“土包子”戏进了中南海

1957年11月 丁酉初冬

1957年11月18日,21岁的石家庄丝弦剧团演员安录昌第一次站在了中南海怀仁堂的戏台上。台下坐着的观众是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陈毅、贺龙、叶剑英、聂荣臻、乌兰夫、李济深、何香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7年井陉拉花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艺术汇演,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当时我还只是个配角呢,也是既紧张又激动。能给这么多领导人演出,这是我们唱丝弦的福呀!”这是安录昌第三次见到周总理,前两次,分别是在7天前的中国文联礼堂和5天前的大栅栏中和剧场。

一个大国的总理,竟在7天之内连看3场石家庄丝弦这种地方“小戏”,这只能用一种“情结”来解释了。周总理说:“那时候(石家庄解放之初),我在石家庄就想看你们的戏,没看成。”总理的遗憾,在时隔10年之后,终于在北京得到了弥补。

1957年11月5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乘着文艺进

京的东风,继井陉拉花之后,被称为“土包子”戏的石家庄丝弦,也登上了首都的艺术殿堂。

“第一次见到总理,我们都激动得不知怎么演了,我师傅反复叮嘱我们千万不能出错,一定要把最精彩的丝弦戏演给总理!”

首场演出很成功,安录昌回忆说。

这天以后,周总理又看过石家庄丝弦剧团两次演出,其中第三次,是在共和国的“心脏”——中南海。

那晚来怀仁堂看戏的,除周总理外,还有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结束后,中央首长们被总理请上了台。演员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都争着和首长们握手,无意中把盲人琴师温明祥挤到了旁边,周总理发现后,赶紧走过去握住温明祥的右手,紧接着,朱德也过去握住了他的左手,把温明祥感动得喜泪横流,不知说什么好,竟咧着嘴失声哭了起来。

在短短一周内,一国的总理三看丝弦戏,特别是石家庄丝弦剧团还被请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们演出,接二连三与丝弦有关的消息震动了文艺界,轰动了北京城。11月23日,即周总理为石家庄丝弦剧团题词“发扬地方戏曲的艰苦朴素和集体合作的作风,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地为人民服务”的第三天,除了中国戏校、北京话剧院及各大剧院争相前来邀请演出,且场场客满以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刊物陆续发表十多篇文章,对石家庄丝弦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时间,石家庄这种地方“土包子”戏名扬天下。

唱响了北京,石家庄丝弦戏红火了十年。十年之后,“文革”的乌云遮蔽全国,“样板戏”成了当时的主流。刚刚当了团长的安录昌被关进了牛棚,丝弦戏陷入了低谷。这场浩劫持续了十年。

“文革”结束后,安录昌重新登台,从此成为石家庄家喻户晓的丝弦名角。

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门一步步打开,丝弦戏场场爆满的情景已成昨日的辉煌。那时,只有农村婚丧嫁娶时,才能听到丝弦戏高亢、悲凉的唱腔。

2006年,石家庄的丝弦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家庄市政府投入30万元,用以招收新学员,排练新剧目。

大人物 小人物

1958 年 6 月 戊戌初夏

1958 年 6 月 3 日,国营华北制药厂验收典礼在石家庄剧院举行。为了这一天,华药的建设者们足足等了 4 年。

1953 年,朝鲜半岛硝烟弥漫,国内百废待兴。这年,作为全国 156 项重点项目之一,抗生素厂筹备处在北京挂牌成立。8 月,北京医学院药系刘剑章等 10 名同学毕业,被“重点分配,集中使用”留在了筹建处。

筹建抗生素厂,首要工作是选址。刘剑章和同事们在石家庄、邯郸、西安、成都、太原、哈尔滨等多个备选城市之间奔波。1954 年底,靠着“华北粮仓,地下水质优丰,气候适宜,毗邻首都,又是重要铁路交通枢纽”的优势,石家庄从众多备选城市中脱颖而出。

华药抗生素厂、淀粉厂和玻璃厂三部分分别交由苏联卫生部、食品工业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设计、施工。1955 年开始施工后,全国各地精英汇聚石家庄,3 月,刘剑章携妻儿由北京搬到石家庄安家落户。

这期间,棉一、棉二、棉三、棉四、棉五、印染厂相继竣工。华北制药厂,在鲍斯贝洛夫、马洛霍夫斯基等 46 名苏联专家和斯维台尔斯基等 11 名东德专家的指导下,也于 1958 年 6 月正式竣工投产。

1958 年,还让石家庄人欢欣鼓舞的是,石家庄市陆续新建、扩建了以“石家庄”为地名标志的化肥厂、拖拉机配件厂、钢铁厂、焦化厂等 73 家化工、机械制造、冶金企业,石家庄市东北工业区初步形成。

工业的大干、快上,让石家庄由此成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一面旗帜。据统计,1958 年,石家庄市工业产值、税收在历史上首次突破 5 亿元和亿元大关,分别为 6.823 亿元和 1.1395 亿元。

与此同时,这个“样板”也频繁接受大人物的造访。如今,时隔 50 年,

华药、煤矿机等企业的老职工，依然难忘接待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东欧、亚非拉国家元首的那一段段激动人心的光辉时刻……

“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

1958年3月 戊戌初春

1958年3月10日,岗南水库在平山县境内滹沱河上动工兴建。此时下游的石家庄已接连遭受了1917年、1939年和1954年三次洪水的“洗礼”。

此前一年的7月,全国人大正式审议了修建岗南水库的议案。

是年,受“大跃进”思想影响,当时的领导提出了“一库变四库”的口号,即用预算修建一个岗南水库的1.8亿资金修建岗南、黄壁庄、七亩、清水口4个水库,工程期由3年缩为1年。不过,由于资金问题,最终只有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建成并能蓄水,黄壁庄水库还顶着“病险水库”的帽子,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摘掉。

修建岗南水库,石家庄、衡水、沧州周边十多个县的10万人参加施工建设。

“当时的情景,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大冬天,工人们还光着膀子干得热火朝天,丝毫不觉得冷。”今年82岁的魏鉴斌老人,曾是岗南水库施工工地技术人员,在他一生参与的水利建设中,留给他记忆最多的是修建岗南水库。

1959年6月7日,年近6旬的周恩来总理来到岗南水库施工现场,特别强调:“必须安置好移民,不能只顾建水库造福下游,而忽视库区移民安置。”

对于老区人民恋恋不舍的党中央旧址,周总理特别批示“重建一个和原来一模一样的西柏坡”。今天,我们瞻仰的西柏坡革命圣地,就是那个时期在周总理的批示下复原重建的。

1969年岗南水库按原设计基本完工。之后又进行了三四次加固和维

护,到1996年基本达到国家一二级水利标准。

期间,岗南水库工程经受了1958年和1963年两次洪水的考验。



1958年3月10日,全省最大的水库——岗南水库动工修建

如今,作为省会头上顶着的“两盆水”,岗南、黄壁庄水库不仅依然承担着蓄水灌溉、发电,保卫京津、京广、京九铁路和华北油田的重任,而且已成为省会230多万市民离不开的两个“水缸”。

“勒紧裤腰带”

1960年12月 庚子隆冬

1960年12月1日,石家庄市粮食局城镇供应科科长郭俊逸踏上了北上唐山的火车。他这次出差的任务就一个:去唐山调粮。

粮食局出去调粮,意味着石家庄的“粮草”储备捉襟见肘。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后来总结国家这段历史时说,全国那三年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3年8月,石家庄暴雨成灾

刘少奇说的那三年,指的是1959年到1961年。1958年,受“左”倾思想影响,与全国各地一样,石家庄也掀起工农业“大跃进”运动。这一年,城乡大兴水利、“大炼钢铁”,群众劳动强度增大,加之农村普遍成立公共食堂,社员集体入伙吃饭,由于安排不当,粮食销量猛增。这一年,全市实销粮食14275万公斤,较1957年增销20.7%。

与此同时,农业“元帅升帐”、“放卫星”、“共产风”、吹嘘“亩产千斤”等浮夸风,也在石家庄城乡蔓延开来。结果,地里的庄稼无人收,使大量粮食、红薯烂在了地里,最终这年实际征购1297万公斤,仅占粮食总产量

的43.1%。

粮食亏空直接影响到来年人们的一日三餐。在最困难的1960年,除了号召全市人民节约粮食,这年9月9日,市委采取口粮低标准和瓜菜代结合的方针,先是把棉仁饼、红黑枣、树叶、山药蔓、秸秆等当做代食品,供应城乡人民。而后,又把原来月人均16.1公斤的粮食定量标准,相继压缩到14.82公斤和14.5公斤。接着,市委又专门召开“吃饭大会”,在全市开展制造“野生植物淀粉”、“人造肉蘑菇”等代食品群众运动,大力推广“粮食增量法”。

“12月1日我去唐山差不多调回来100万斤玉米。”郭俊逸回忆说,全市库存粮食最紧张的时候只够供应5天。这段时间,石家庄吃遍了除西藏、台湾以外从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调来的粮食。但是,因长期营养不良,肝炎、浮肿、妇女闭经、子宫下垂、伤寒等一系列疾病在社会上出现。

冬去春来又一年。1961年1月,市委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停办了农村集体食堂,1962年,石家庄全区粮食丰收,总产6.95亿公斤。这年,市民勒紧了3年的裤腰带才渐渐松了下来。

“那段日子,一个人每月才只有3斤白面和近1斤油,其余全是棒子面、红薯等粗粮。”郭俊逸在粮食局工作了40年,对比近50年来市民餐桌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位曾为市民四处奔波筹粮的老“粮人”感慨万千。

一块手表的记忆

1966年6月 丙午初夏

1966年6月初的一天,上工的钟声响过后,晋县马于公社吕家庄大队高贞年等7名社员像往常一样,推着独轮车,说说笑笑向地里走去。

这一天,吕家庄依旧炊烟袅袅,风平浪静。但此时国内一场更大的浩劫,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

就在一个月前,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紧接着,大字报式的口诛笔伐、串联甚至是武斗开始在城市升级、蔓延开来。

对于后来在“文革”中发生的事,高贞年并没有多少记忆,但这年6月他捡到的一块手表,却让他足足铭记了一生。

这天,高贞年等7名社员一起在给棉花追肥时,从尿素的牛皮纸外包装和塑料袋内包装的夹层中掉出来一个“小东西”。这个“小东西”金灿灿的,有刻盘,有指针,还有手链,高贞年以前没有见过,他估计应该是块手表。

40年前,有着百年恩怨的中日两国尚未建交。在中国农村,手表就像人们如今谈论的UFO一样罕见。所以,手表的发现,一开始被怀疑是一枚日本炸弹。好在弄清楚后,高贞年很快把表上交给驻在大队上的“四清”工作组。

第二天,手表又由工作组交到了马于公社。公社书记根据捡手表的来龙去脉写了封信,连同手表装进一个特制的木匣,交到了县里。之后,通过石家庄地区行署、省、北京和中国驻日本廖承志办事处这个链条一路追根寻源,这块手表飘洋过海,终于又回到了它的主人手中。

日本人的手表从他们熟悉又陌生的中国越海回归,这场民间“手表外

交”，当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轰动。《大阪每日新闻》以《竟有这种事！丢失的东西混在硫铵中去中国旅行归来》为题，首先详细披露了手表“旅行”归来的过程。同年10月10日，日本山口县知事山本正之和失主永静江分别致信时任晋县县长的魏永平。附着感谢信，山本正之和东京都知事宇都宫德马还各自寄来一台“SEIKO”电子钟和20个搪瓷烟灰缸。

收到这封信，12月3日，《人民日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如今，山口县知事山本正之的感谢信和20个烟灰缸已随岁月的流逝不知所终，当年高贞年在全县拾金不昧表彰大会上获得的奖品——一套《毛主席语录》也已无从查找，唯有这座米黄色的电子钟，至今依然尘封在晋州市档案馆里。

一块手表，让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感动了日本人民，由此，高贞年的名字名垂青史。以表为媒，石家庄也第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如此清晰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这一时代中国人“大公无私”的精神风貌。

想念你,我的日本朋友

1967年7月 丁未盛夏

混乱的人群、疯狂的面孔……1967年7月的一天,19岁的吴焕芝与他同岁的好友林瑞祥穿过街头“武斗”的人群,还好,俩人都没有受伤。

吴焕芝与林瑞祥是中学校友。校友的身份加上特殊年代的这段武斗经历,使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而林瑞祥特殊的个人经历,又使得两人的友谊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石家庄今天的地方志里记载着这样一段话:“1953年,国家将从日本回国的31名华侨安置到石家庄定居,这是定居石家庄的第一批华侨。”林瑞祥一家就恰恰在这31名回国华侨里。

林瑞祥祖籍福建闽南,其父早年入台在二战中被抓到日本做劳工,后来与当地一名女子成家。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遭受着沉重的战争赔款与严重的经济危机。无奈之下,日本向国外输出侨民以缓解压力。一起和林瑞祥一家回国的侨民达到了十几万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回国的并不仅仅只有日本华侨,印尼华侨、朝鲜华侨等一大批人陆续回到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他们中,有的人是为了回国学习中国文化,有的是为了归来建设新中国,还有的则是为脱离外国排华的环境而投奔祖国。

凌彤,1931年11月生于印尼坤甸,他的原籍是广东新会。从小,他就受到父母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深知自己是一名炎黄子孙,是一名龙的传人。

“我回来就是为了学习祖国的传统文化。”1948年,凌彤怀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向往,毅然踏上归国的路程。

回到祖国的他,先是在北京辅仁大学附中学习,后又毕业于中国医科

大学,1956年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河北医学院工作。当年二十多岁的凌彤,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不论是在“有一些同事因饥饿无法继续工作”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是在连家书都要被检查的十年“文革”期间,他都一直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并在医学上颇有成就。

与凌彤有着类似经历的林瑞祥,回到祖国后享受到同普通中国孩子一样的待遇。小学、初中、高中,他都没有被周围人看做另类。他的日本血统也并没有引起曾被日军侵害的中国老百姓的丝毫歧视。

吴焕芝是在上中学时认识林瑞祥的。一天,吴焕芝听到有人喊林瑞祥“小日本”,这让他很奇怪,而林瑞祥不反驳的态度更让他感到疑惑。在他的追问之下,林瑞祥说出了自己是日籍华侨的身份。乍听之下,吴焕芝很惊讶,但却并未因此而疏远林瑞祥,反而更加珍惜这份友谊。

林瑞祥一家虽对外声称自己是福建闽南人,但邻居们其实都知道他们的日籍华侨的身份。可贵的是,大家都没有因此而歧视疏远他们一家人。林瑞祥的母亲是日本人,汉语水平不高,居委会有事时,邻居总是亲自上门通知他母亲。邻里都称赞林瑞祥一家都是老好人,从没和人发生过争执。“小日本”的称号也只是因为林瑞祥个子较矮,并无恶意。

1966年,正在高中读书的林瑞祥被迫放下书本参与“文革”。几年后他又响应国家的号召,随大批知青一起上山下乡,参加农村建设。后来他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到石家庄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石家庄一所小学任教。日本华侨林瑞祥,随着中国政策脉搏的跳动,参与着历史变革,他慢慢地褪去身上的“日本”烙印,俨然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林瑞祥的父母于1972年回到日本。而林瑞祥与妹妹,直到6年后才回日本和父母亲人团聚。

回日本前林瑞祥心里并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只是默默地收集着能寄托他对中国留恋的东西。

1978年8月的一天,林瑞祥大老远地蹬着车子、抱着西瓜、含着热泪出现在了吴焕芝的门前。吴焕芝还清楚地记得,林瑞祥在走的时候,带走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还有好多富有中国特色的工艺品。临行前,他拍了大量的照片,在石家庄展览馆前、在毛主席像前、在大

佛寺前、在火车站前……他用这些定格记忆来寄托对这片土地的留恋。并且他特意找中国厨师学做地道的中国菜，说回到日本后要做给亲人们吃。

几十年过去了，吴焕芝曾嘱托在日本留学的女儿，与已经改名叫小林稔的林瑞祥联系。但是由于时间过久，这位日本朋友已经联系不上了。吴焕芝每每提起这件事时都流露出真挚的感情：“我十分想念他。”他真诚地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再见到自己儿时的伙伴。